

# 商周时期祖先神崇拜的特点新论

何飞燕(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博士生)

王林林(延安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硕士生)

**摘 要：**商周时期为我国祖先神崇拜最为发达时期，对祖先神的祭祀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甲骨文、金文资料并传世典籍综合分析，商、周祖先神崇拜，有着各自的特点：商代祖先神崇拜的特点是商王掌握着对祖先神的祭祀权，其祭祀是遍祀商王先祖；周代的祖先神崇拜是分层分级的。二者不同的根源在于宗法制的完善、健全与否。

**关键词：**祖先神崇拜 商周时期 甲骨文 金文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商、周时期是祖先神崇拜最为发达的时期。商和周在祖先神崇拜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和各自的特点的，这种区别和特点，是与其宗法等级密切联系的。笔者在此通过传世文献及一些甲骨文、金文资料，来对商周时期这一特殊阶段的祖先神崇拜进行研究，对其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以期从中管窥中国古代祖先神崇拜的端倪。

## 一、商代祖先神崇拜的特点

从文献资料及殷墟卜辞来看，商代的神权崇拜可分为三个方面：上帝崇拜、祖先神崇拜、自然神崇拜。《墨子·明鬼下》在对先秦时期的鬼神崇拜进行概括时说：“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这里所说“天鬼”就是上帝神灵，“山水鬼神”就是自然神灵，“人死而为鬼”就是祖先神灵。殷墟卜辞大部分内容为祭祀祖先神的，明显地可以看出商人对祖先神是特别崇拜的。这也正好印证了《礼记·表记》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商代祖先神崇拜的特点，简要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商王掌握着对祖先神的祭祀权，由此而高度控制着神权。

商代的神权高度集中于商王手中，商王主要掌控祖先神祭祀权。商王不仅祭祀商王室的祖先神，还祭祀非王室成员的祖先，《尚书·盘庚上》云：“古我

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尔祖”指的是非王室的商人族支的祖先。表明除商王族以外，其它非王室商族的先祖也可以附祭于商先王。如伊尹附祭于上甲微（明义士《续编》513），附祭于大乙汤（《殷契萃编》151）等，可知大祭先王时附祭先臣，是殷代的制度。<sup>[1]</sup>不仅祭祀商王祖先神的权力掌握在商王手中，祭祀非王室成员祖先神的权力也掌握在商王手中，非王室成员的祖先神的权力受商王祖先神的支配，如果非王室成员不听命于商王，商王就会告诉其祖先神，使得非王室成员的祖先神受到其子孙的牵连，并弃绝、降罪于其子孙。《尚书·盘庚中》云：“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因此，商王利用这种祭祀权高度集中于商王一人之手来控制非王室成员，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第二、宗法制度不健全的殷墟文化遍祀商王先祖。

商代有无宗法制度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的学者认为商代已经存在宗法制度<sup>[2]</sup>，有的学者认为商代还不存在宗法制度<sup>[3]</sup>，也有学者认为商代早中期并不存在宗法制度，直到商代晚期康丁之后才逐渐形成以嫡长子继承制度为特征的宗法制度，但是和周代相

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招标课题“中国早期文字与文化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05JZD00029



比，商代宗法制度显然是不大健全的<sup>[4]</sup>。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是对的，商代从晚期康丁之后才逐步建立起宗法制度，但是与周代那种十分健全的宗法制度相比，显然还不很成熟，在制度上还很不健全。

也正是因为商代宗法制度的不成熟和不健全，商代祭祀祖先神就不完全是按照与商王亲疏远近来祭祀先公先王，而是以祭祀范围广、祭祀数量多作为其时代特征。

商代的祭祀名目繁多，“为了免祸祈福，殷人向他们举行多种祭祀，祭名包括燎、酒、侑、禘、取、奏、沉、报、告、舞等，并用酒和牛、羊等牺牲献祭，甚至以人为牺牲”<sup>[5]</sup>。其祭祖用牲数量多，祀典也是特别隆重的。如：

其又升大乙，羌五十人。（《合集》26908）

贞：御自唐、大甲、大丁、祖乙，百羌百牢。

（《合集》300）

商代祭祀的范围很广，祭祀时尽力追溯其传说中早期的祖先。卜辞所载有夔、王亥、王恒等，其中有的还被尊称为“高祖”（始祖）。如：

惟高祖夔祝用，王受又。（《合集》30398）

其告于高祖王亥，三牛。（《合集》30447）

其侑于王恒。（《合集》14765）

据陈梦家的统计，商人崇拜的远世高祖神主要有夔、王亥、土、季、王恒、岳、河等十位，这十位“是卜辞中所常见而重要的，其它还有不少”<sup>[6]</sup>。

根据晁福林先生研究，商代的祖先信仰具有如下六个特点。第一，祖先神是殷人祈祷的主要对象；第二，殷人祭祖尽量追溯传说中的早期祖先；第三，殷人对女祖先的崇拜虽逊于男祖先，但仍很显著，在整个商王国时期，女祖先一直受到重视，这反映出殷人原始思想仍很浓重；第四，殷人祭祖用牲数量多，祀典特别隆重；第五，殷人先祖多被分为若干祭祀组，如“大示”、“小示”等，分组的目的是为了遍祀祖先，避免遗漏。后来，又发展出周祭制度。殷人虽然对父、祖辈更为重视，但始终没有忘记对全体祖先的祭祀；第六，殷人不但尊崇王室的祖先，而且敬仰非王室的祖先。<sup>[7]</sup>

商代的祭祀形式也很多，有对一位先王或先妣的单独进行祭祀的单祭，有集合多位祖先同时进行祭祀

的合祭，有商人对近世直系祖先举行多种特殊祭祀的特祭，还有周祭。周祭是商王及王室贵族用翌、祭、贡、孚五种祀典对祖先轮番和周而复始地进行的祭祀。这种祭祀是一个王世接一个王世连绵不断地举行下去的，是商王朝一种非常重要的祭祀制度。

商王虽然对祭祀父、祖辈很重视，但始终没有忘记对全体祖先的祭祀。商王祭祀先祖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种遍祀祖先神的周祭制度来体现的。商代盛行的这种周祭制度终止于康丁，常玉芝先生从周祭制度的周期上考察了康丁之后的武乙、文丁是不属于周祭系统的。<sup>[8]</sup>同时她认为到了商代末期，宗法制有了发展，盛行对近世直系祖先的特祭制度。<sup>[9]</sup>即这种祭祀制度的改变是由于宗法制有了发展。裘锡圭先生指出，卜辞中的“父乙帝”、“帝丁”、“帝甲”、“文武帝”的“帝”是时王对死去的王父的专称，此“帝”即“嫡”。而卜辞中与“帝”字相对的“介”字，连以亲属称谓，如介子、介兄、介父、介母、介祖的“介”字与“庶”字义同。是嫡、庶的词语，在商人的语言里已经出现了。<sup>[10]</sup>单从语言文字上看，“嫡”、“介”（“庶”）的出现，只能说明商代已有嫡、庶之分，并不能完全说明商代就出现宗法制。商代在康丁、武乙之前有嫡庶之分，但并无宗法制；到了康丁、武乙之后才有了自幼而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同时建立了“祖迁于上，宗易于下”的宗法关系，商人的宗法制度才逐步建立起来。<sup>[11]</sup>在商代宗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反映在祭祀上就不存在重近祖轻远祖的意识，故商代盛行的周祭制度只有先后次序之别，呈现出一种遍祀祖先神的情况，不能反映出宗法制度所强调的“亲亲”关系，只是到了商末，宗法制发展了，其祭祀制度才随之发生了变化。

## 二、周代祖先神崇拜的特点

周代的祖先神崇拜与宗法制度密切相关，周天子以嫡长子继位，是“大宗”，是天下共主，各国诸侯为“小宗”，但在其国内对卿、大夫而言，又是“大宗”，依次类推于卿、大夫、士。祭祀权力的等级划分与现实政治权力的等级相对应。从现实生活到宗教领域都是层层分级的，因此，周代的祖先神崇拜也是分层分级的。

宗法制决定了周代社会的特色是阶层分化明显，等级制度严格，在宗法制度下，祭祀权不是集中在王一人手中的，祖先神崇拜是分层分级的。等级化的祭祀权限，决定了各阶层享有的祭祀权不同，周代祖先神崇拜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不同的阶层为祭祀祖先神而设立的庙数不同。

周代有严格的庙数之制，根据宗法制以及周代贵族等级地位的不同，各级贵族设立的庙数是有严格规定的。《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就是说周天子可以设立七庙，诸侯可以设立五庙，卿大夫可以设立三庙，士阶层只能设立一庙。士是周代贵族阶级的最下层，设立的庙数也是最少的。所以士阶层之下的庶人就不能设立庙了，只能在寝室去进行祭祀。这就充分说明了不同阶层的祭祀祖先神的权力是不同。贵族阶层越高，为祭祖而设立的庙数也就越多；而地位越低，设立的庙数也就越少。以至于平民则被剥夺了祭祀高祖的权利，社会阶层越低，祭祀的对象就越少。

### 2. 周代不同阶层祭祀所用祭品不同。

周代的祭祀过程中，根据祭祀者所处的阶层不同，所用的祭品也因人而异。《国语·楚语下》：“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大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就是说天子在举行盛宴时，使用的是牛、羊、猪三牲的大牢，祭祀时使用的是三倍于大牢的会；诸侯在宴飨宾客时，使用的是一牛，祭祀时才使用牛、羊、猪三牲的大牢；卿在宴飨宾客时使用的是羊、猪二牲的少牢，但使用一牛来祭祀；大夫宴飨宾客时使用一猪，但用羊、猪二牲来祭祀；士吃的是鱼，却以一猪来祭祀；庶人则是吃菜，以鱼来祭祀，无论那个阶层平常所用的都不能超过祭祀所用之牲。《国语·楚语上》也说：“其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饔，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笱豆脯醢，则上下共之。”诸侯国的国君在祭祀时使用牛、羊、猪三牲，大夫在祭祀时使用羊、猪二牲，士在祭祀时仅使

用猪一牲，庶人则以鱼来祭祀，祭祀时使用不同的祭品，就是各阶层身份等级的标志。

《礼记·王制》云：“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寝不踰庙。”表明诸侯没有祭祀或宴飨的事是不宰牛的，大夫没有祭祀或宴飨的事是不宰羊的，士没有祭祀或宴飨的事是不宰狗杀猪的，一般民众在没有荐献先人的时候是不吃比较珍贵食物的，人们为了敬祖，平常吃的菜肴不要超过祭祀用牲，平常穿的衣服不要超过祭祀穿的礼服，自己居住的寝室不要超过先人的宗庙。这不仅说明各阶层祭祀所用的祭品不同，也反映了对祖先的尊敬。

《礼记·曲礼下》：“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这也是说在祭祀先祖的时候，天子可以用毛色纯正并经过精心圈养的牛，这就叫做“牺牛”；诸侯可以用经过挑选的肥牛；大夫可以用经过挑选的一般牛，士只能用羊或者猪了。而且祭祀的主持人只能是以嫡长子身份获得继承权的宗子，庶子是没有权力去祭祀先祖的；如果要祭祀，也要取得宗子的同意才能进行。

### 3. 周代不同阶层在祭祀时使用的器具及其数量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周代的不同阶层在祭祀活动中，不仅所使用的祭品不同之外，其所使用的祭祀器具的数量和规格也是有严格的区分的。《周礼·春官·小宗伯》载：“小宗伯之职，……掌五礼之禁令与其用等。”《周礼正义》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这就是说“小宗伯”是掌管不同阶层的有等级差别的祭祀器用。这种不同阶层祭祀器具的规格和数量有很大的不同。《礼记·礼器》云：

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簋。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簋。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簋。此以多为贵也。

有以少为贵者：天子无介，祭天特牲。天子适诸侯，诸侯膳以犊。诸侯相朝，灌用郁鬯，无筯豆之



荐。大夫聘礼以脯醢。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单席，诸侯视朝，大夫持，士旅之。此以少为贵也。

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

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觶，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甒。此以小为贵也。……

有以下为贵者：至敬不坛，埽地而祭。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棊禁，此以下为贵也。

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

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罍、棹杓。此以素为贵也。

从上可见，在周礼中，从周天子到公卿、诸侯、大夫、士、庶人在祭祀之中，所用器具有所不同，数量多少有所不同，丧期时间有所不同，祭祀方式有所不同，而且服饰花纹也有所不同。

#### 4. 周代的宗法等级制决定了祭祀权限不同。

周代宗子、庶子祭祀的权限有十分显著的区别。虽然一个宗族的所有成员都是宗族祖先的后裔，然而只有继承了大宗地位的宗子，才有主持祭祀宗族祖先的权利。

因为负责祭祀的大宗的地位必须按嫡长子继承的原则世代相传，这种现象在周代祭祀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被称作“大宗”或“宗子”，有时又称之为“冢子”，实际上是表明这一位置的继承人主要是具有主持祭祀先祖权利的人。《说文·宀部》：“宗，尊祖庙也。”《释名·释宫室》：“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地也。”因而，所立的宗庙是先祖形貌所在之处。宗庙不仅是一个宗族祭祀祖先之处，宗族内部重要的典礼都要在宗庙举行，重大的决定也要在宗庙举行。这种现象即使在战国时的文献中也有十分清楚的记述。

从金文材料来看，周代宗法制度更为完善，嫡、

庶之分更为明确，金文中多次出现“嫡”，以及与“嫡”相对应的“庶”。金文中的作器者多称自己的父亲为“嫡考”，表明自己为嫡子。

客簋铭：“兄（祝）人师眉，羸（羸）王为周客赐贝五朋，用为宝器，鼎二、鬲二，其用享于厥帝（嫡）考。”（《集成》7.4097）

仲师父鼎铭：“仲师父乍季（从女从支）始宝尊鼎，其用享用考（孝）于皇祖帝（嫡）考，用赐眉寿无疆，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享。”（《集成》5.2744）

章叔将簋铭：“章叔将自乍尊鬲，其用追孝于朕（从啻从父，嫡）考，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集成》7.4038）

叔买簋铭：“叔买自乍尊簋，其用追孝于朕皇祖、啻（嫡）考，用赐黄耆、眉寿，买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集成》8.4129）

上面铭文中的“帝考”、“啻考”中的“帝”、“啻”均通用为“嫡”，从《说文》可知，“嫡”的声符“商”小篆就是“啻”字，故可通用。这些铭文中的作器者自称自己的父亲为“嫡考”，说明自己就是嫡子。《礼记·祭法》云：“统土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有祔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祭法》中“统土”指“统”通用为“嫡”，也就是嫡士。嫡士依周礼可建二庙，但“庶士庶人无庙”，说明上面这些作器者应该是嫡士以上的贵族阶层，可以作器祭祀自己的祖父和嫡考。

在周代，祭祀先祖的权力只能是具有继承权的嫡长子，也就是“宗子”，其它庶子是没有祭祀先祖权力的。《礼记·曾子问》说：

曾子问曰：“宗子为士，庶子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国，庶子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摄主不厌祭，不旅，不假，不绥祭，不配，布奠于宾，宾奠而不举，不归肉。其辞于宾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国，使某辞。’”

《礼记集解》云：“嫡子，谓父及祖之嫡子。庶

子，谓嫡子之弟。宗子，谓大宗也。宗妇，大宗子之妇。舍，止也。舍于外而不敢毕入，所以降下于宗子也。”<sup>[12]</sup>从上面的引文可见，庶子尽管贵为大夫，也要携带祭器到有祖庙的为士的宗子家进行祭祀，并且要由神职人员的祝以宗子的名义向神主致辞：“孝子某为介子某荐其常事”，是说宗子某人替庶子某人向祖先神进献通常的祭品。当宗子有罪居于他国时，庶子在宗子家中的祖庙自己祭祀、祝祷，但仍要以宗子的名义进行祭祀，“孝子某使介子某执其常事”，表明是受宗子支使才进行祭祀的。由此可知，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大宗宗子的嫡长子虽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是作为家族宗子的地位和权利仍然存在，祭祀的大权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嫡长子手中。可见那些后起的庶子尽管地位贵为大夫，但仍要在身份为“士”的嫡长子亦即宗子的名义下祭祀先祖。不仅如此，这些代替宗子进行祭祀的庶子们“摄主”，在祭祀中的权力是大打折扣：“不厌祭，不旅，不假，不绥祭，不配，布奠于宾，宾奠而不举，不归肉”，也就是说在祭祀完毕后不再将食品供奉在房屋西北角的地方，祭祀完毕宾客们与本族兄弟们不再自上而下地交错酬酒，先祖神灵的扮演者“尸”不代表祖先神对摄主进行祝福，等等。这些无非说明非宗子身份的祭祀者在祭祀权利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且祭祀前还要向前来助祭的宾客致词说：“宗兄（或宗弟或宗子）现在在国外，让某人代行祭祀并向您们报告。”在大宗宗子不在的情况下要进行祭祀，其它庶子虽然同样是同一祖先神的后人，但是实际上没有正式祭祀的权利，只能是代替宗子担当临时性的主祭人。这种现象与后代不分嫡庶凡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均有祭祀祖先神权力大大不一样了。因此《礼记·曲礼下》说“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支子”也就是“庶子”，这就是说周代不仅不同阶层的人祭祀所用牺牲、祭品不同，而且庶子是没有祭祀权力的。如果要祭祀先祖，也必须告诉宗子取得同意后才能进行祭祀。

《礼记·内则》还说：

嫡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妇。虽贵富，不敢以贵富入宗子之家，虽众车徒，舍于外，以寡约入。子

弟犹归器，衣服、裘衾、车马，则必献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献，则不敢以入于宗子之门，不敢以贵富加于父兄宗族。若富，则具二牲，献其贤者于宗子，夫妇皆齐而宗敬焉，终事而后敢私祭。

这就是说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有一些嫡子和庶子已经富裕起来，有的做了官，超过了宗族掌门人宗子富贵程度，但他们不能显示自己的富贵程度，要很恭敬地事奉宗子；也不敢带领众多的车辆人马进入宗子之家，如果进入宗子之家，只能带领少量的车马进入。而且必须要把衣服、裘皮、被子、车马等被赏赐的器物进献给宗子。特别是如果嫡子和庶子富贵，每逢祭祀先祖的时候，就应该准备两套祭祀用牲品，把好的献给宗子，这些嫡子和庶子夫妇进行斋戒，届时到宗子宗庙中去助祭，等宗子祭祀完毕，才能回到自己小宗宗庙里去祭祀自己的近亲祖祢。由此可见，宗子和一般的嫡子、庶子在祭祀上的等级区别是十分明显的。

从金文材料看，作为宗子的嫡长子不仅有祭祀祖先的权利，其死后还享有被祭祀的特权，铭文中就有“用享大宗”之语。如：

卢钟铭：“唯正月初吉丁亥，卢乍（作）宝钟，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泝（乐）好宾，卢罍（暨）蔡姬永宝，用邵大宗。”（《集成》1.88）

陈逆簠铭：“台（以）享台（以）孝于大宗皇考（祖）、皇妣、皇考（考）、皇母……子子孙孙永（永）保用。”（《集成》9.4629）

兮熬壶铭：“兮熬乍尊壶，其万年，子子孙孙，永用享考（孝）于大宗。”（《集成》15.9671）

上面这些铭文中的“用享大宗”、“用邵大宗”、“台（以）享台（以）孝于大宗”、“永用享考（孝）于大宗”，是指用做成的钟、簠、壶等器物去祭祀曾为大宗宗子的父辈祖辈。从《集成》9.462陈逆簠铭所说“台（以）享台（以）孝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考）、皇母”，说明陈逆是用新做成的簠要去祭祀曾为大宗宗子的皇祖、皇妣、皇考、皇母。

周代的大宗宗子又可称之为“大子”，也就是“太子”，在西周金文中也有专做青铜器去祭祀“大



子（太子）”的情况：

诸女卣铭：“亚丑，者（诸）女大子尊彝。”  
（《集成》3.917）

姜鼎铭：“庚申大保赏姜贝，用乍（作）大子癸宝尊。”  
（《集成》5.2703）

这两件铜器铭文中的“大子”也可能是作器者同辈的已去世的嫡长子，也可能父辈或祖辈大宗宗子，亚丑、应是非嫡系的庶子或非嫡长子的嫡子，他们作器只能到到大宗宗子的宗庙中去进行祭祀。正如《礼记·内则》说的这些非大宗的嫡子或庶子只能作器到“宗子”的宗庙去进行祭祀，所以在这些器物上也明确记载是用作“大子”的“尊彝”或“宝尊”。可见这些青铜器铭文体现的西周先祖祭祀制度是符合传世文献中所说的宗法制度中的嫡庶关系。

### 三、小结

通过以上对商周时期祖先神崇拜的各自特点的论述，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出，商代的祖先神崇拜，仍然没有摆脱中国古代原始社会遍祀群神的落后状态，对其商王先祖不管关系远近或者不分血缘亲疏，殷墟文化都遍祀商王先祖。并且，对商王先祖的祭祀权，却完全是掌握在商王一人的手中，由此商王也就完全掌控了神权，拥有了政教合一的至上权威。这一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与商代的宗法制度不健全和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社会向政治文明转型期的特殊阶段所决定的。

到了周代，随着宗法制度的完善和健全，中国古代的祖先神崇拜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宗法制决定了周代社会的特色是阶层分化明显，等级制度严格，在宗法制度下，祭祀权不再集中在王一人手中，祖先神崇拜也就开始分层分级。等级化的祭祀权限，决定了各阶层享有的祭祀权不同，使得不同的阶层在祭祀祖先神的时候，为祭祀祖先神而设立的庙数、祭祀过程中所使用的祭品、器具的名称和数量，甚至祭祀权限等，都有着明显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使得中国古代的祖先神崇拜问题在周代完成了转化并完全定型，

完成了中国古代祖先神崇拜从原始的、盲目的、多元化的诸神崇拜到单一的、固定的、等级化严重的宗法制度下的祖先神崇拜制度。这一定型的成功，使得中国古代的祖先神崇拜长期以来的在宗法制的体制下发展前进，一直影响着往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注释：

- [1] 顾颉刚、刘起舒：《尚书校释译论》第2册，中华书局2005年，第946页。
- [2]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法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杨升南：《从殷墟卜辞中的“示”、“宗”说到商代的宗法制度》，《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 [3]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84年，第456页，第458页；郑慧生：《从商代无嫡妾制度说到它的生母入祀法》，《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晁福林：《关于殷墟卜辞中的“示”和“宗”的探讨——兼论宗法制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期。
- [4] [11]王 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6 - 309、287页。
- [5] 齐文心、王贵民：《商周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 - 105页。
- [6]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337 - 345页。
- [7]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 [8]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4页。
- [9] 常玉芝：《说文武帝——兼略述商末祭祀制度的变化》，《古文字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80年，第205 - 233页。
- [10]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17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
- [12]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中华书局1989年，第740页。